



繪本《敵人》

網絡圖片

這個世界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只分為好人和壞人？或者只為朋友和敵人？只知道這些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是怎樣形成的，我也不知道一切事情為什麼都要追求定論？但我知道，這個世界的複雜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紛爭和我不明白的事情，而我寧願像一個孩子一樣，安靜地坐在沙發的角落，就着檯燈柔和的燈光，讀一個簡單的繪本，這個繪本的名字叫《敵人》。「這是一場戰爭，一片如同沙漠般荒涼的土地上……棲息着兩個孤單的洞。每個洞裏分別駐守着一個士兵。他們是敵人。」這是意大利作家David Cohn和法國插畫師Serge Bloch的作品。文字與畫風都非常簡潔，卻又透紙背。洞裏的士兵不會相見卻彼此攻擊，從其中一個士兵的視角看對手是這樣的：「……我和他之間，有着天壤之別。他毫無同情心，殘忍如野獸……這個世界上有戰爭，就是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存在……他不但會殺死我，還會殺掉我所有的家人。他殘殺動物，焚燒樹林，還在水裏下毒。總而言之，敵人根本就不能算人。」

是的，敵人總是這樣的，他們幾乎一無是處，他們做什麼都是錯的，他們就是這個世界上存在戰爭的原因。而自己卻是那樣的無辜。為什麼這位士兵會有這樣的感受呢？書裏說了——「我對這些道理瞭若指掌，因為我在戰爭手冊上都讀到過。」是的，我們總是被這樣「告知」，被這樣「教育」。這樣的事情在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作者將這感受濃縮在繪本淺顯的語言裏，帶着一點童稚，卻對這個世界發出深刻的質詢。後來這位士兵在一個暗黑的深夜借助偽裝向對方的洞口爬去，準備偷襲——「只要我把他殺了，戰爭就結束了。」可是當他爬到的時候，洞裏卻沒有敵人，只有敵人的物品。他帶着十二分的驚訝審視了這些敵人的物品，「還有他的照片，像是一張全家福。難道他還有家人？……他如果有家人，怎麼能下手殺掉女人和小孩？」最可怕的是他是一個有人性的士兵！……我從不會殘殺動物，焚燒森林，在水裏下毒。……我從沒殺過女人和小孩。」作者用淺顯談話的語言讓小朋友們感受到這場戰爭的荒誕。你所被告知的那個敵人是否正是你所知的樣子？而你的形象在你所認敵人眼中也是同等面目猙獰。

這個世界其實本來就是個多元的世界，人們之間有各種想像的和歷史文化造就的種種「天壤之別」，但是人類仍然有共同的追求。《敵人》這個繪本中是這樣呈現的，這場戰爭實在是曠日持久，當仰望星空的時候，美麗而深邃的星空，讓他們覺得這場令彼此消耗的戰爭是那樣的沒有意義，他們想要結束這場戰爭……

這絕不止是一本描述戰爭的書。這個故事怎樣結束也不重要。讀這個故事時，我又不禁想起孩子曾經在學校參與的一個新聞閱讀的計劃。這個計劃的核心是讓學生從新聞中去分辨哪些屬於事實的部分，哪些是帶有偏見的描述，以及哪些是帶有既定立場和偏見的言論。這個閱讀計劃非常有意義。成人們不斷地教導孩子們要在紛繁的世相面前，閉關雙眼，思考和不帶偏見，思維要開放而不偏激，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常常無法給孩子們樹立良好的榜樣。社會上很多激烈的衝突也都源自於彼此的一「看不見」。我們對於我們所謂的「敵人」充滿偏激的想像而不自知。我們這個社會或者我們的族群不斷地因為各種原因在撕裂，我們認為都是所謂「敵人」的錯。當一個政府、一個社會、一個族群失去反思的能力的時候，我們不妨坐下來，讀讀小朋友們讀的書。如果我們不謙卑，我們就連一個孩子的智力都不如。如果我們沒有智慧，只有偏見，如何面對這個複雜的社會呢？

敵人

徐海娜



燈下集

匆匆那年



往事鈞沉

晚飯後，拉薇妮娜打電話過來，告訴我達莎被查出肝癌晚期，時日無多了，我震驚無語，一時之間，我彷彿看見達莎站在那裏衝我微笑，依然是光潔細緻的皮膚、漂亮的小翹鼻子，一如從前。儘管自從離開哈勒，我就沒有再見過她，聯繫也隨着時日的推移越來越少，但是我清楚地記得她的樣子，記得那短短的一年裏共同相處的每一個人的名字，記得那些簡單卻又快樂的日日夜夜。

那是我剛到德國的第一年，在哈勒讀大學預科。當時我們班上有從希臘、摩洛哥、波蘭、敘利亞、巴勒斯坦、印尼等國家來的近二十個同學，其中與我關係最密切的是來自羅馬尼亞的拉薇妮娜和俄羅斯姑娘達莎。

哈勒是原東德的一個城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兩德剛合併不久，哈勒還保持着過去的面貌，隨處可見的是四四方方的實用性樓房，我們的學生宿舍也是這麼一棟灰漆漆的建築，是五座一模一樣的大樓中的一座，因為居中，被稱為「C片」。拉薇妮娜和達莎同住一間房間，與我只隔一條走廊。我們每天清晨一起乘短途火車去上學，下課回來結伴去附近的超市採購，至於一起做作業或是準備考試就更是很經常的事。剛開始的時候，因為大家的德語都不夠好，所以交流起來很費勁，但是隨着時日的漸進，我們成了形影相隨的朋友。

也許因為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同學之間有一種別樣的惺惺相惜，在那個破舊的城市裏，我們的口袋裏都沒有什麼錢，也不能肯定將來會到哪裏去，但是我們那麼年輕，心裏有的是夢想，所以，清貧的生活、簡陋的環境都不足以破壞我們對未來的信心，同時，規律的生活節奏以及父母般的老師、穩定的班中集體都給予我們一種暫時的安全感，在這個健康的框架之下，我們共同度過了一段純淨單純的光陰。

我記得，有次在檯燈下做作業，忽然臂上奇癢，低頭一看，一隻螞蟻正順着我的臂膀往上爬，我的尖叫肯定全世界都聽得到；記得有一次在公車上，有惡作劇的德國青少年將口香糖黏在我的頭髮上，我哭着回來，拉薇妮娜是怎樣小心翼翼地幫我把頭髮清理乾淨；也記得達莎在檯燈下精心地替我塗人生裏的第一次指甲油；記得我們一起去看了史提芬京（Stephen King，內地譯：斯蒂文·金）的科幻電影回來，我嚇得晚上睡不着覺，抱着被子去拉薇妮娜和達莎的房間打地鋪；還記得我們的文學老師將她寶貝兒子的結他借給我，條件是我有一日要給大家演唱；當然最記得的，是課堂上不斷的笑聲。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有着不同的語言與風俗，有的時候，一句相同意思的成語在不同的文化裏就會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比如德國人不買「裝在袋子裏的貓」，因為看不到裏面到底裝着什麼，這讓我想起了中國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但是我當時不會說「葫蘆」這個詞，就跑到黑板上去畫了一隻葫蘆；還有一次，我們練習繞口令，老師讓我們每人先用自己的語言說一段自己國家的繞口令，我們都不懂彼此的語言，那效果可想而知，尤其是當來自蘇丹的同學大着嗓門一氣喝來，彷彿一大堆的鋼球被劈里啪啦地倒在了搪瓷盆裏，我們被逗得捂着肚子笑岔了氣。如果說笑一笑十年少，那麼我們那一年裏的笑早就把我們打回娘胎裏去了。

達莎當時只有十八歲，是我們中間年齡最小的，她出落得像一朵早晨的玫瑰花，看見她給人一種太陽正在冉冉升起的感覺。她喜形於色、敢愛敢恨，彷彿毫無心機清澈见底，其實她的心裏並不像她有時看上去那樣沒有主見。

一天下午，達莎在我的房間裏給她的杯子勾繡墊，忽然門鈴響起，出去一看，是越南男生阮文志，給我送來了一大紙箱即食麵，他進門看見達莎，很友好地跟她打了個招呼，把紙箱放在桌上的時候，他看見上次帶給我的即食麵紙箱敞着口放在門後的架子上，很詫異地說：「你這麼快就吃得剩這幾包了？」我點點頭說是啊，又不會做飯，有即食麵還不得天天吃？他聽後很生氣，正色道：「這種東西偶爾吃吃是調劑，天天吃會生病的！能有營養嗎？你以後要是還敢天天吃這個，我就再也給你送了！」達莎一直盤腿坐在我的床上，繼續勾她的勾針，一聲也不吭。等阮文志走後，達莎挑起了根眉毛，壞壞地斜眼看着我說：「你們倆挺合適的嘛！」我推了她肩膀一下，叫她不要胡說。她挺冤枉地叫道：「他對你怎樣，我們早就看出來了，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我一時語塞，其實我也知道他對我好，但是我從來沒有往別的地方想過啊！要說阮文志這個人，確實無可挑剔，他十七歲就來到德國，與我相仿的年紀，卻已經在哈勒大學讀醫科，而且成績驕人；不僅如此，他非常善良，為人正直，外形俊朗，我實在找不出他哪一點不好，不知為什麼，我對他就是沒有特別的感覺，有朋友的情義卻沒有男女之間的喜歡。但是我覺得不能這麼跟達莎直接說，如果這話傳到他耳朵裏，會非常傷人的。情急之下，我說出了日後讓我慚愧不已的話，我說：「這怎麼可能呢！他是個越南人啊！中國和越南沒幾年還打仗呢！」

達莎聽了這話，一把拋掉了勾針，坐直了身體，她好像不認識我了似的，看着我的眼睛說：「我沒想到你是這樣的人！你竟然會因為一個人的國籍或者政治（傾向）去評斷一個人！」她的臉漲得通紅，越說越激動：「兩個國家打仗，那麼那個敵對國家的人就都是壞人嗎？種族歧視就已經很荒唐了，政治歧視簡直是愚蠢！」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很想說，我們前兩年還給前線寫信呢，後來我姐得到了帶有一塊彈片的回信，令我羨慕不已；也想想，要是真有感情，那麼管他是不是地球人都無所謂，但是我最後什麼都沒說，不只是因為我的德國當時沒有達莎那麼溜，而是我知道她說的沒有錯。事隔多年，每想起這次吵架，我對達莎的正直與清醒都會越發地感到敬佩。達莎是在前蘇聯的政權下長大的，但是她卻能有自己的頭腦與見識，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匆匆那一年過去，我們奔赴德國不同的城市，開始了各自的大學生活和今後的人生，之後的二十多年，同學之間相聚寥寥，除了拉薇妮娜，我和其他人的聯繫越來越少，包括達莎，只知道她個人生活很不幸，離了兩次婚，現在又聽到這樣的噩耗。我對拉薇妮娜說：「咱們一起去看看達莎吧。」她說：「我們現在就定個日子好嗎？越快越好，否則就太晚了。」我來不及嘆息世事無常，我只是紅了眼眶。



▲哥可島周邊是二十公里長的美麗海灘

網絡圖片

再登古巴「椰子島」

徐貽聰



外交圈

今年春節期間，隨着二十來位中國旅遊者，從哈瓦那乘坐包租的旅遊大巴東行五百餘公里，歷時八個多小時，再度登上古巴的「椰子島」，享受陽光、沙灘、海水和清新的空氣，雖然旅途勞頓，但心情真的感到很舒服。

我說「再登」，是因為二十多年前在「椰子島」剛剛開放的時候，我曾經於古巴政府的友好安排下在那裏小住過幾天，對它的美麗至今記憶猶新。這次又前往，理應為「再」，實非妄言。

古巴國家不大，除主體為島外，還有大小島嶼數千，名副其實的「島國」。「椰子島」位於古巴北部沿海的中部地帶，學名，或者地圖上用的名字是「哥可島」（Cayo Coco，即「椰子島」的意思，得名主因是島上野生的椰樹特別多，但無人居住。Cayo Coco又譯為「科科島」），所以我一直習慣稱它為「椰子島」，我覺得這樣稱呼它顯得更親切，也沒有改變它的原意。

我第一次去看它時還是在古巴常駐期間，具體地說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在一座約二百平方公里的島上已經有了一座頗具規模的「旅遊城」。其實，「旅遊城」就是島上的首家酒店，因為其十多座各種不同式樣、樓層從一到五不等的大小建築，鱗次櫛比，間隔不等，其間還穿插有成群的別墅式獨棟小樓和風格各異的商店、酒肆、冷飲店、郵政服務網點等，老闆在酒店中間掛起大幅廣告標語：「旅遊城」。這個小島的環境和首家酒店的風格讓我感到很為新鮮、驚喜。聽取了它的建設歷史和發展設想的介紹，則不僅更為驚訝，而且在嘆服中增添了對古巴人民及其革命領袖卡斯特羅的敬佩之情。

人們向我介紹，古巴擁有三百多個海灘，個個都非常美麗，真的可讓人對古巴的「得天獨厚」產生「嫉妒」。大部分海灘都集中在北部沿海，「椰子島」是其中擁有海灘較多的島嶼之一。這個島的周邊有約二十公里長的海灘，白沙藍水，色彩斑斕，非常誘人。由於以前的政府關注不夠，很多海灘都缺少開發，有些連人跡都沒有，利用率很低，也阻礙着國家的財政收入。為了推進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卡斯特羅主席親自規劃並指揮落實旅遊業的發展措施，指導設計了幾條連島（道路）工程，在海島上總共填造出了長一百多公里、寬八米（雙向行車道四米，兩側各有兩米的護坡和管線通道）、高出海平面兩米、能抗擊七級風暴的「海上長城」。從主島岸邊到「椰子島」長達三十多公里的長堤，以及從「椰子島」伸向兩側的近五十公里海上公路，是這一龐大、艱巨工程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對工程所需的、如同天文數字般的石頭應該如何採集、運輸、填造和配套的想像中，我愈益感嘆工程的艱難和建設者的堅忍不拔。在島上的三天中，隨着主人的腳步，我幾乎走遍了島上的各處海灘，從而也明白了古巴政府為什麼下那麼大的決心去進行如此艱巨的建設。因此，我至今記得，當陪同我的古方人員充滿驕傲地對我說「你們中國有萬里長城，我們古巴有『海上長城』時，我立即贊同並讚賞了他的友好比喻。

環島「觀光」途中，我還同車上的司機和乘務人員進行了隨意的交談。他們告訴我，島上依然沒有固定居民，所有的工作人員均來自主島，基本上是所在單位接送上下班。雖然工作比較辛苦，但收入情況還好，因此大家多感到頗為高興。他們還說，政府的連島工程很有成效，正在動手擴大，準備將連島公路從「椰子島」再向東填海、延伸，將鄰省的海島也連接進來，以擴大接待能力。從他們喜形於色的談話中，我感到的實惠在帶給他們歡樂。

第一次去「椰子島」時，是受別人邀請，未便了解費用問題。此次再去，屬自費旅遊，當然需要問清價格。古巴的旅遊酒店屬於「全包型」，即房費、一日三餐（為一定檔次的自助餐或散點餐）、餐中的酒水，如紅、白葡萄酒、啤酒等，以及在酒店內全天的各種飲料、娛樂和健身活動等，都憑入店時發給的塑膠腕圈在現場索票即可，無需另外付款，只自己視情況付點小費，但多數人並不付給。房間裏冰箱裏配置的飲料亦如此辦理）。我們一行的費用是人均每日八十元外匯券（即八十美元），約合人民幣五百元，對於一間四星級酒店而言，應該算是「大眾化」吧。

我對同行的旅伴們說，「椰子島」真的太美了！我老了，不知道是否還會有機會再來島上看看。但是，我確實期待古巴的「連島工程」能繼續帶給他們的國家更多的富裕和人民更大的幸福。

島上沒有固定居民

再度來到「椰子島」，我曾利用一個上午，離開旅遊團隊，花了五元外匯券（即五美元），乘坐敞篷的觀光大巴，歷時四個多小時，冒着車行「海上」產生的強風，往返約二百公里，沿途觀景。我看到：連島公路多有加寬，且大部分路段都已有濃密的護坡灌木；島上的公路已經形成蛛網狀，而且縱橫交錯、密度相

險被遺忘的美術奇才

葉周



東西走廊

維也納還有一位在美術界獨具特色的畫家曾經被人遺忘，他就是埃貢·席勒（Egon Schiele，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八年）。他是維克里姆特之後維也納分離畫派的重要人物。他最有名的一幅畫《裸男坐像》（Seated Male Nude, 1910），似乎是他的自畫像，一絲不掛，作品具獨特風格。而他的裸體畫在前輩們爭論。

席勒出生在多瑙河畔的圖爾恩，那是維也納以西約二十英里的一個小鎮。他於一九〇六年被享有盛名的維也納藝術學院錄取。席勒的作品富表現力而又非常大膽，但他的裸體畫作在維也納的傳統藝術氛圍中經常被輿論聲討。一次，警員在他屋中發現了大量「淫穢」圖像，他還被送進監獄關了二十四天。

一九一八年克里姆特去世後，席勒被視為他的繼承人。席勒也逐漸受到藝術市場的歡迎，其畫作在他當年最後一場展覽中全部售罄。然而好景不常，一九一八年十月，懷孕六個月的席勒夫人因西班牙流感去世，席勒在三天後因同樣感染了病毒

而隨妻子而去，終年二十八歲，可謂英年早逝。

埃貢·席勒死後似乎被人完全遺忘，他的重新被發現應該歸功於維也納眼科專家魯道夫·利奧波德。二戰後的幾年裏，熱愛維也納分離派藝術、特別是席勒作品的利奧波德開始購買他所見到的每一幅席勒作品，不久利奧波德就成為了世界上擁有最多席勒作品的收藏家。一九七二年，他出版了藏品的目錄全集，使世人再次記起這位被忽略的卓越藝術家。奧地利政府也專門在維也納博物館區設立利奧波德博物館，展出席勒的作品。

扭曲，古怪，深刻，從外在的扭曲中，將人的精神的內在暴露無遺，這是席勒作品留給我深刻的印象。赤裸裸的肌肉塊狀突出，充滿力量，表達得淋漓盡致，重要部位一絲不掛盡展無遺。你站在他的畫作面前難免不被深深地震撼。

二〇一三年利奧波德博物館舉辦了一個名為「從一八〇〇年至今的裸體男子」的展覽。展覽的策展人託拜厄斯·納特說：「席勒為藝術家繪畫裸體自畫像打開了一扇門。」

（維也納遊記之二）



▲埃貢·席勒的畫作

作者供圖